



英国档案中的《田中奏折》

解永春

内容提要 《田中奏折》问题不仅和中日两国有关,也引起了在中国有着巨大利益的英国的关注,因此在英国的档案文献中保存着不少与之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既有对《田中奏折》真实性的质疑,也有对其内容可信度的某种肯定。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英国人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将《田中奏折》放在远东国际关系中进行考察,比较重视《田中奏折》所反映的日本政策与现实的联系,试图通过《田中奏折》来分析日本对华政策的走向,显示出《田中奏折》对第三国影响的不同特点。

关键词 英国 中国 日本 《田中奏折》 远东

《田中奏折》作为抗日战争史乃至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中日两国学者围绕该奏折争论不断,真伪问题一直是两国学者争论的焦点。长期以来,大部分日本学者认为该奏折是伪造的,包括井上清、江口圭一在内的很多进步学者也同意这一看法。^① 但江口圭一同时也指出:“《田中奏折》的真伪,和是否存在与《田中奏折》类似的计划、方针以及总体上对田中外交的评价等是不同的问题。”^②也就是说,日本右翼否认《田中奏折》的着眼点在于否认对华侵略的事实,而进步学者对《田中奏折》的质疑则是出于学术上的思考。

有的中国学者对《田中奏折》的获取途径表示怀疑,认为其“许多内容严重失实,以及它的行文风格和格式不符合日本公文程式……很难说是一国总理大臣的公文书,更难说是外交政策的奏章”,但又指出其内容所述确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真实写照,“因此对于有些仅根据其中的一些错误,就完全抹杀其存在的做法,是很难同意的”。^③ 因此,《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彻底淡出研究者的视线。

进入 21 世纪以后,关于这一问题又产生了新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服部龙二在《日中历史认识:日中在〈田中奏折〉历史认识上的相克》一书中,详细梳理了《田中奏折》从出现到 21 世纪在全世界流传的过程,指出中日双方围绕日本侵略计划性的争论依旧存在。^④ 然而可惜的是,该书就美国方面对《田中奏折》的态度着墨较多,但有关英国对此问题的关注则付之阙如。

① 井上清『日本の軍国主義』、岩波書店、2004 年。

② 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義史論 満州事变前後』、青木書店、1975 年、301 頁。

③ 邹有恒:《对蔡智堪取得田中奏章的质疑》,《外国问题研究》1987 年第 4 期,第 1—7 页;邹有恒:《〈田中奏折〉真伪论》,《外国问题研究》1994 年第 1 期,第 1—16 页。

④ 服部龍二『日中歴史認識:「田中上奏文」をめぐる相克 1927—2010』、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 年、314 頁。

英国对《田中奏折》又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战后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海军史专家马丁·布莱斯(Martin Brice)的论述,他在1973年出版的《皇家海军与中日战争1937—1941》一书中说:“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其是否于1927年出自田中首相之手,又或者它是伪造品。它可能是由日本官方渠道借田中之名所发布,也可能是中国方面对日本可能行为的一种想法。可以确定的是,许多日本人也持有与《田中奏折》中所表达的相同的思想……《田中奏折》成了日本版的《我的奋斗》”。^①无独有偶,一位有长期在华经历的英国记者布鲁诺·肖(Bruno Shaw)也将《田中奏折》视为“可以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相比的征服世界的蓝图”。^②

笔者在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搜集相关资料时,注意到一些有关《田中奏折》的资料散见于英国外交部(The Foreign Office)的相关报告以及英国陆军部(The War Office)汇总的相关文件中。通过阅读和分析这些资料,英国是如何看待《田中奏折》的,这也许能够为理解相关问题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

英国档案中对《田中奏折》的最早记录出现在1931年4月21日,这一时间比《田中奏折》在中国报纸上的公开晚了一年多。^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是在九一八事变前不久才开始关注《田中奏折》的。英国陆军部下属的陆军情报局总处(MI1c)获取了一本由中国评论周报社印行的英文小册子,题为《日本与下一场世界大战:关于中国东北、蒙古、中国、美国和世界的秘密备忘录(第9版)》。^④这份被英国称为“田中备忘录”的小册子即《田中奏折》。1931年5月6日,陆军情报局的一位未署名的少校将这份文件转给英国陆军情报局远东分局进行分析评估:“我在此附上这份来自奉天的文件,此件由某某(姓名被故意隐去——引者注)从一位在奉天兵工厂任职的陶贝男爵(Baron Taube)^⑤处获得的。陶贝告诉某某这份文件的日文原版来自于一位在日本军校读书的中国学生,这个学生又将其交给了张学良领导的奉天当局,被奉天当局先后译为汉语和英语。……我个人严重怀疑这究竟是不是一篇译文,以我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份极其聪明的宣传品,目的不外乎在东北激起反日情绪……但如果此件为真,那么将对了解日本在东北的政策提供极大帮助。”^⑥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田中奏折》来源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由蔡智堪从日本皇室藏书库中抄录而来不同。从以上英方的报告来看,其认为这份文件系中方伪造的宣传品,主要是由于它的公开与中国东北当局关系密切。

1931年7月3日,远东分局汇报了其对《田中奏折》的初步判断:“我们对这份文件很感兴趣,这主要是因为它可能是日本在东北和内蒙古的政策指南,但我们认为其标题可能不确。从文本的大意及对当时一些事件的描述判断,如果此件为真,这份备忘录似应作于1929年的上半年……这

① Martin Brice, *The Royal Navy and the Sino-Japanese Incident 1937—41* (London: Ian Allan, 1973), pp. 17—18.

② John J. Stephan, “The Tanaka Memorial (1927): Authentic or Spuriou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7, No. 4 (1973), p. 734.

③ 1929年12月号的《时事月报》刊登了中文版《田中奏折》的部分内容。

④ Japan and the Next World War: Secret Memorial Concerning Manchuria, Mongolia, China, U. S. A. and the World 9th edition, WO 106/5604.

⑤ 根据现有资料,可以判定此人为服务于中国东北武器工厂的瑞典籍专家。

⑥ Secret File from MI1c, 21 Apr. 1931, WO 106/5604.

份文件中的一些观点是某些日本军官经常公开主张的,因此其基本信息应该来自于日本陆军大学校(Japanese Staff College),我们知道这里有中国学生学习,但并不被允许参加所有讨论。我们怀疑是某些中国学生获知了这类讨论的部分信息并将其传递给了奉天当局,最终作为宣传材料予以公开。另一方面,由于其中包含的信息大都可以从公开渠道获知或者可以从已知信息推导出来,所以这份‘备忘录’也可能是彻头彻尾的宣传品。无论此件是真是假,它都可以被认为至少代表了一派日本人的政策主张。”^①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田中奏折》中的一些观点是真实存在于部分日本人之中的,而这些观点被中国人综合、加工成为《田中奏折》,其本质上是一份宣传品。

英军的驻日武官也认为《田中奏折》只是代表了部分没有掌权的日本人的意见。1931年8月7日,英国陆军情报局负责情报分析工作的鲍登(H. Plowden)少校收到其驻日武官辛姆森(Colonel Simson)上校的报告,文中称:“日本的外交政策从1929年起发生了巨大转变,越来越倾向于脱离参谋本部(General Staff)的控制(原文如此——引者注),但这份文件却模糊地提出同时与美国、苏联和中国为敌,参谋本部不可能做出如此规划。尽管日本内部总有人希望比目前控制的更多,但这份文件所提出的计划远远超过了日本最激进的人所能正常设想到的程度。日本目前还主要是维持现状,其不会重蹈德国在一战时的覆辙,挑战远比它强大的敌人。总之,这份文件颇有奇怪之处,它很可能代表了一部分日本人的思想,不过这些人并未掌握政权。”^②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有英国人把九一八事变和《田中奏折》联系了起来。尽管英国政府并未明确反对日本的侵略,只是表示希望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但是仍有一些英国驻华外交人员希望通过强调《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以促使英国积极应对九一八事变乃至日本在远东的扩张。

1931年11月2日,英国驻北京公使蓝普森(Miles Lampson)亲自向英国外交部报告称,九一八事变后亲赴东北调查的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索恩希尔(Colonel Badham-Thronhill)上校发回报告,指出“鉴于目前的满洲事态,《田中奏折》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③索恩希尔指出,此前有一种说法认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一位成员最早获得了“奏折”并将其译为英文,但张学良在与索恩希尔的会谈中透露了关于获得这份文件的内幕消息。张学良亲自询问索恩希尔对《田中奏折》真伪问题的看法,然后转而对在座的顾问端纳(W. H. Donald)说,他是花费了14000美元从日本外相币原手中获取的这份文件。张学良还表示希望不要将这个信息外传,因为他已经对外宣称是通过在日人员获取的这份文件。索恩希尔称,他认为张学良说的是真的,因为没有说谎的必要。^④张学良透露通过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获得《田中奏折》这一信息,与其他对《田中奏折》的来源解释都完全不同。无论是王家桢还是蔡智堪都宣称受到了日本内部人士的帮助而抄取了《田中奏折》。^⑤但张学良的这一说法缺乏其他证据支持。在此难以认定张学良是否有意欺骗英国人,因为毕竟他只是对其私人顾问做出的上述表态。不过,从英国驻华武官和驻华公使报告的态度来看,他们显然认为九一八事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田中奏折》内容的真实性。

① Pamphlet, “Japan’s Positive Policy in Manchuria”, WO 106/5604.

② Letter to Major H. Plowden, 7 Aug. 1931, WO 106/5604.

③ F 7649/1391/10, Colonel Badham-Thronhill to Sir M. Lampson, 28 Oct. 1931, FO 371/15506.

④ F 7649/1391/10, Colonel Badham-Thronhill to Sir M. Lampson, 28 Oct. 1931, FO 371/15506.

⑤ 参见沈予《关于〈田中奏折〉抄取人蔡智堪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282—301页。

英国等国对九一八的关注迫使日本不得不进行自我辩护。1931年11月12日,日本驻国联代表团对国联理事会提出照会,原因是“一份重要的日内瓦报纸刊载了《田中奏折》的部分内容”^①,为了向国联理事会主席和各理事国解释此事,日本国际联盟局局长泽田节藏在照会中指出“日本政府早已知晓这份文件的存在,但是鉴于其内容存在明显错误以及对读者所具有智慧和常识的信任,认为无需对其进行书面否认。另一方面,尽管不断地秘密传播这份文件,尤其是在1929年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上,中国宣传部门也从未敢于正式发表这份文件”。^②

实际上,日本曾正式否认过《田中奏折》的真实性,驻华临时代理公使重光葵也曾于1930年4月7日就此向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提出过抗议,并要求中方对相关宣传予以取缔。中方表示会尽可能地取缔与之相关的宣传品,但很难彻底禁止一切相关小册子的发行,中国官方报纸可以引用“日方公文”加以说明,这一建议得到日方同意。^③1930年4月12日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上以《田中密奏的真伪问题》为题刊登了报道,称有“提倡中日亲善者”历数《田中奏折》的错误,并指出“该项小册子之所载,既如是颠倒矛盾,若任其广事流传,诚恐有影响于中日之邦交,是固不得不有以善处之云云”。^④实际上《中央日报》对“提倡中日亲善者”的上述观点(即日本方面的观点)并未置评,反而在标题下添加“以小册子形式在中国各地流布”、“历叙日本阴谋殊令人不寒而栗”等小标题,与其说是“以正视听”倒不如说是对《田中奏折》进行宣传。

三

1932年10月时值国联对“李顿报告书”进行审议的关键时刻,因此英国也在试图确定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10月7日,英国外交部出台了一份题为《关于中日冲突问题:重要性和挑战》的备忘录,强烈建议英国对日本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制止其在远东的侵略。在谈到中国东北问题时,备忘录还特别指出日本对加拿大也采取了类似的渗透政策,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甚至印度也是日本觊觎的对象,并警告日本可能对处于不设防状态的荷属东印度发动攻击,最终统治整个太平洋地区。在提到日本对华“二十一条”和《田中奏折》时,称“正是由于这些正式文件,我们才不得不考虑海军裁军与国际安全的联系问题”。^⑤尽管并未点明,但备忘录显然已经将《田中奏折》作为阐述其政策主张的重要参考。它主张的政策就是“两个英语民族(指英国和美国——引者注)之间密切、忠实而坚决的合作……粗略地讲,就是外交、金融、经济制裁逐渐增强”而“联合对日本施压的目的是迫使那些以日本之名行动的人最终服从国联,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很可能是使日本公共舆论最终转而对其军队和政府产生敌意。”^⑥

1934年6月8日,远东分局在分析伪满建立后的中国局势时再次提到《田中奏折》,指出“《田中奏折》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积极政策做了总结,但作者的野心没有局限在东北甚至没有局限在中国……这份文件不够连贯,其中包含的大部分信息都是当时我们已知的,或者可以从已知事实中

① Communication from the Japanese Delegation, 12 Nov. 1931, WO 106/5604.

② Communication from the Japanese Delegation, 12 Nov. 1931, WO 106/5604.

③ 「7(六)田中上奏文問題二関スル王正廷ノ談話」、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426900、満洲事变(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二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善後措置関係/国際連盟ニ於ケル折衝関係/日支事件二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十一卷上(1)(A-1-1-0-21_12_1_5_02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④ 《田中密奏的真伪问题》,《中央日报》,1930年4月12日,第1张第4版。

⑤ Memorandum on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Its Significance & Challenge, 7 Oct. 1932, FO 371/16179.

⑥ Memorandum on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Its Significance & Challenge, 7 Oct. 1932, FO 371/16179.

推测出来。除了全篇着墨最多的涉及修建铁路的部分以外,并未提出什么明确的建议……鉴于目前的形势,也许这份文件最令人感兴趣的特点是,作者看起来早已意识到了内外蒙古今后与日本和苏联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争取蒙古王公好感的必要性。我们现在知道日本的视线正在向东转到蒙古身上,并在不懈地努力试图吸引蒙古王公们。除此以外,此件中没有什么可以表明作者比任何其他熟悉远东事务的观察者掌握更多情报或更有洞见;我们同意驻日本大使馆认为这份‘奏折’是‘完全虚构’的观点”。^①

在这些分析意见中可以看到,尽管英国人依然认为《田中奏折》是“完全虚构”的,但还是意识到其中的部分内容是真实的。^②此后他们也认为《田中奏折》的内容越来越多地变为现实,越发警惕日本扩张的野心,直到1941年12月日本进攻英属马来亚,日英兵戎相见。^③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发现,英国官方首次对《田中奏折》有所关注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是通过陆军和外交部进行的,并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其进行了集中分析,这显然与中国东北的局势有关。虽然英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态度比较消极,但仍然会对日本在华动向有很大的关注。因此,一年多以前就被公开的《田中奏折》才引起了英国的重视。以陆军部和外交部为主的英国相关部门虽然基本上认定《田中奏折》是伪造的,但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加深,英国人也越来越相信至少其中部分内容具有相当高的真实性,这一点与中国现在不少学者的观点有比较多的相似之处。^④

[作者解永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Tanaka Memorial, Memorandum by MI2(c), 6 Aug. 1934, WO 106/5604.

② Summary of Message Addressed to “the People of Friendly Countries” by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on January 23, FO 371/24659.

③ F2653/27/10, Sir A. Clark Kerr to Viscount Halifax, 16 Apr. 1940, FO 676/429.

④ 步平、北冈伸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